

中国转型社会学 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李友梅

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能迎“变动中的当代”新知识体系

转型社会学所面对的是社会转型提出的重要问题。社会转型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系统性特征发生了变动,比如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动等。西方社会转型的早期研究,概要地说,提供了三个维度的重要成果:其一是经典社会学家如滕尼斯的文明转型研究、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研究、韦伯的理性化趋势研究;其二是随着西方社会快速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出现的诸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贝克与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以及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源于拉美发展的“依附理论”、源于东亚社会转型研究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其三是面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实践,由布达佩斯学派展开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研究。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相继提出的如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赫尔德的“全球转型理论”以及阿瑞吉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等全球转型理论。这三方面理论的核心视角主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即结构性力量的变动、社会不平等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转型社会文明形态的变动等。可以说,西方理论话语是西方地方性知识的体现。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既有类似西方的快速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等一些过程,又有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的现代性内核。值得提醒的是,回顾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我们聚焦中国社会转型的讨论尚未形成清晰有效的知识积累,在很多核心问题认识上的学术脉络还不够清晰可见。有学者用西方社会转型研究中提出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时,来观察和破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性,由此引发人们思考社会如何建设的问题。虽然我们多少看到了各国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地方性实践经验,但当我们对不同学术知识积累的路径及其社会文化土壤的基础缺乏比较分析时,接续别人的讨论时便少了对这些路径中含有的方法论和这些基础所特有的深层构造的敏感性。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思考,应该放在什么“时空错落”之中?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很多,但共识却较少。在世界与中国趋于复杂化的互联互通新条件下,如何识别中国社会转型与区域、全球社会的交互关系,我们在推进更高层面的中国理解 and 世界认识中往往是“缺席”的。当我们讨论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历程时,第一,我们必须确立能够有效推进学术知识积累的基本问题域,以及聚焦在基本问题域之中的、从经验到地方认识再到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学术框架;第二,我们应该思考判断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之变化逻辑的依据及其所依托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第三,我们还要思考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其文化内核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全球本土化的复杂影响又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体现出哪些综合性、层次性、不确定性等既有社会转型实践所未有过的新特征。总之,我们迫切需要形成具有崇高境界且我们向心力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当前的一个任务是能够为贴切反映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机制而肩负起构建学术理论工具的事业型学术共同体。

中国正经历的社会转型是史无前例的,这个社会转型是一个总体性现象,同时又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项工作的时效性将首先取决于我们学术共同体能否跳出既有的各式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对社会转型具有系统性的想象力以及能否加快提升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



找到理解自身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转型的问题域

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面对的不是某一领域的特定现象而是一个总体性现象,这一总体性现象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体性社会,而是置身于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基本背景框架之中。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这种基本背景框架和社会转型的认知,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是存在着缺少历史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去脉络化”问题。当思考难以回到有效知识累积的理论学术脉络中时,就易导致研究失焦,或与社会脱节的思维失效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党的十九大指出,这个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这表明了社会治理更加具有了总体性意义,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被写入了党章,成为了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意味着,党要通过基层党建引领,来带动社会治理开展整体而系统的创新实践,并在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同时,提升对社会系统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能力,进而使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系统都能有效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共识基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并不改变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将成为转型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新课题。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复合性”的。一方面,要继续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基础、最古老的如贫穷、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命题,如生活品质、治理参与、可持续发展等。我国社会转型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也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面对这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一套新知识,这套新知识不仅是超越过去以学科为主的知识系统,而且涉及这套新知识应如何建构的深刻问题。要对中国社会变迁如此快速剧烈作出有效的回应,需要我们将历史脉络所蕴含的时代意识或历史意识作为重要起点,更好地定位当代社会文化新现象。在历史脉络与学术脉络中,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转型的目标、视野、方法和思想的问题域。

向现代性理论提出的根本性挑战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这为当代中国的转型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课题。我们不仅需要回答,使得千差万别的社会成员能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当中,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生共荣的社会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问题,而且要清晰地辨识这个社会体系的运行规律。还要能够向世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性在中国与世界的复杂联系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的。因此,创建我们的能够反映如此复杂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然而,我们以

往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之变化逻辑的判断依据,不同程度上都遇到了重要挑战。我们对自身文明内核及社会运行法则与机制的研究思考,常被既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下的现代性观念所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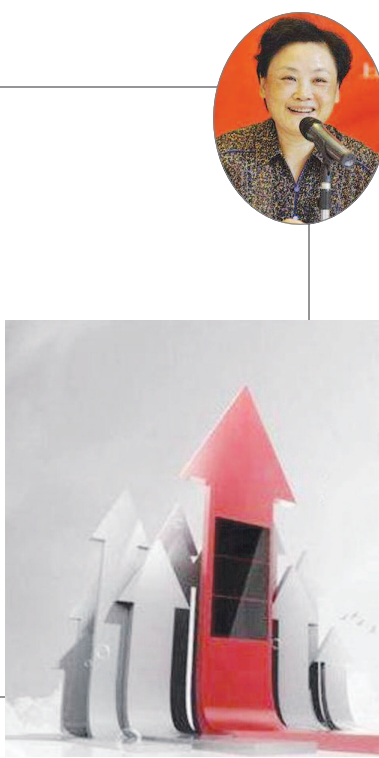
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问题也在“知识的区域化”与“特定历史的脉络化”这一双重前提下加以讨论。中国转型社会学被视为一个可以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其现实基础是中国在自身文明脉络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程。当前,全球化的变化逻辑越来越模糊不清,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全球性。我们不仅深深嵌入到深度全球化进程,而且参与到全球性“思维失效”的焦虑之中,不论国际或国内学界,研究者多半充满着焦虑与不安,因为国际学界近几十年的努力也没有对认识与回应全球性问题有更显著的进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现代性被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中国现代性实际上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的一部分。(王宁,2011)

早在1920年代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里谈及的姐姐费达生的社会实验,即已看到中国人所践行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现代性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不失世界性,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选择,变革的道路首先离不开中国社会最深处的社会文化土壤。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从未停止过对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的抵抗,这种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汪晖,1997)

一个世纪匆匆而过,如今,当我们站在中国和全球关系相互变革与适应的历史新起点,来思考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总结及其理论构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描绘中国所走过的现代性历程并评判其得失?如何在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危机中持守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同时为当今世界现代性发展贡献中国道路所依赖的中国智慧?这需要对我们的现代性问题的由来及其历史发展轨迹有清醒的认识,更紧迫的是加快提升我们思维方式的更新能力。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迅速发展向现代性的理论考察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挑战,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性研究竟应在何种“时空错落”中加以考察和认识,这是一个必须予以剖析的基础性命题。

要发现各种社会转型间的交互关系和依存机制

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套新知识体系既要能够使世界看到“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理解是什么,又要对“变动中的当代”所蕴含的整体性问题作出有效的中国认识。但是,我们很多人不仅欠缺对中国社会转型历程的整体关照和深刻洞察,而且常常被既有观念和认识所限,或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陷入了“另类现代性”的陷阱之中,从而妨碍思维创



新和有效处理“变动中的当代”新课题的新知识生产。

所谓“另类现代性”,从其概念的初始意义而言,“另类”即透射出西方中心的视角,其本质上是一套“分类”标准意在强调对某种标准化的偏离。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对现代性分类概念的既有认识上,就无法理解当代普遍的全球性跨界现象。从1970年代末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性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危机日趋严重。全球性问题不仅仅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后果,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让我们看到全球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各经济体、社会、自然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让整个世界上所有地互联互通起来。但全球化利益并未惠及每个国家,这对全世界的社会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全球化的特征中既有“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也有“各国为己”走出“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新老机制叠加交错、复杂重组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和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转型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的生成机制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和相似的表现,一如全球化在思维方式和战略战术上从来就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应对这些新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对影响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将会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难以洞察和把握自身的当代际遇和历史命运,就难以回避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的未来。在关系中所隐藏的深刻危机。我们亟需构建的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以便超越既有的思维惯性和西方与东方这种“二元”思维逻辑。在与国外前沿学者的沟通和对话交流中,我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很想到中国将如何向世界诠释自身的新角色,中国将如何向世界阐释自己所倡导的全局观和世界观;他们非常希望这个阐释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是如何践行其国内“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以及在这个践行中是如何与国家间、区域间、世界等多维多层次建立并发生联系的。特别是在现代性理念的价值观念层面上,或许更需要我们在“多元世界观”的认识基础上,超越“各国为己”而寻求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这一挑战,需要得到中国社会科学者以更具创新思维的想象力和综合性的超越能力来对正在浮现中的“多中心”与“多元现代性”的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的全球化,都是各种几乎同时发生的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强化、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当代构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此过程中发现各种社会转型间的交互关系和依存机制。现实中,这些机制常常是难以“意会”的,我们深感这个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

讲好教育学的“中国话”

邵庭瑾 李世奇

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须立足本国国情、世情、教情。

- 扎根鲜活的教育实践
- 立足本民族语言
- 发挥科际整合的优势
- 保持本国的教育自信
- 讲好中国的教育故事

话语体系是指特定场景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信息系统,包含一套严密的词汇语法、逻辑思维、专业术语以及表达规范等。话语体系旨在帮助学术以及其他行业共同体进行信息交流和对话,促进知识的传播、经验的积累、能力的提升。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是在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有关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学术话语的统称,是对教育发展的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总体特征的刻画和概说,集中反映了教育学学科建设、国家文教政策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对教育活动的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观念的整体认知。

三个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一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学界迫切要求突破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范式,重建教育学学科。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逐步冲破凯洛夫教育学所构建的话语体系——教育学原理、教学论、教育论、学校管理的局限。关于教育本质(教育是否为上层建筑的争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讨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体制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元教育理论的兴起,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表征的重要范畴。二是,198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学界对工具化取向的教育现象及以升学为导向的办学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使教育认识逐步转向对人的发展本身的关注,触动了对教育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三是本世纪后至今。在这一时期,诸多具有中国阶段教育发展特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如素质教育理论、中国教育体制理论、教育与生命和生活的关系等众多议题相继进入教育学术话语的广阔视野中,激活和丰富了中国教育学话语思维结构。中国教育学界开始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对话,就教育变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世界同仁展开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讨论,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更深层次的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纵深发展。例如“素质教育”已成为专有名词,被译为“Suzhi Education”,逐渐得到国际学界认同,并被收入英国教育大辞典,其国际影响力可见一斑。

五点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须立足本国国情、世情、教情,植根于鲜活的教育实践,要基于社会历史发展方位,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与国家民族复兴、社会繁荣进步以及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等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组织和动员中国教育学术界整体性地参与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工作。

一要扎根鲜活的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只有扎根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个人与社会、国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物质实践活动,与教育学的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相一致,才能充分揭示和反映本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独特性,才能被社会广大民众和教育学术

共同体所认同。如此,教育学话语体系在解释教育运行与发展规律的逻辑中方能自洽有余,更具实践指导性和理论张力。比如上海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程中率先启动、率先探索,围绕教育治理创新、基础教育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及大中小德育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先行先试的创新实践,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贡献了智慧、积累了经验。来自这些生动鲜活的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完全应该成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最有价值的素材和原料。

二要立足本民族语言。尽管运用西方语言同国外同行进行教育学话语体系交流非常重要,但是中国教育学话语必然是以本民族语言来诠释有关中国教育学与个体、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话语体系构建的符号系统载体是文字和语言,而运用本国文字和语言来描述某一学科话语体系是一国学科话语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话语体系的基本模式首先就意味着说和听,意味着对话和交流。

三要发挥科际整合的优势。要发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等交叉学科的优势,特别是教育与其他多学科之间的跨界生成与融合。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类框架下,教育学话语体系要避免简单地偏执依附于其中一方,而应明确地趋向于学科开放、科际整合、视野融合。在学科性质上,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积极主动地汲取自然科学前沿研究的有益养分,通过学科开放、科际整合与视野融合,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校园等场景中,找寻本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突破点;在脑科学与教育深度学习、ICT移动智能学习终端等领域抢夺世界教育学话语体系前沿的制高点。

四要保持本国的教育自信。长期以来,在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醉心于民国初年的教育救国迷幻,动辄缅怀民国教育理想;另一种是痴迷西方欧美如今的教育理念如何先进、教育科技如何发达。这两种观点片面地忽视了中国国情世情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必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土壤,漠视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在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中,呈现出失去自信力的莫名焦虑。因此,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回归本土,凝练中国传统文化意蕴;要立足现实,建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要面向世界,贡献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五要讲好中国的教育故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尚未在本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成就所彰显的本国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道路优势还需要进一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知。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对教育学话语体系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有关主客体认识发展过程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精细刻画;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更加自觉地地从丰厚的传统文化中获取营养、积极开展具有首创精神的教育实践、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反映教育发展的时代精神。诸如纽约时报的弗里德曼在蔷薇小学所发现的“上海的秘密”、上海的数学课堂在英国伦敦所引起的瞩目等。应组织和动员中国教育学术界整体性、全方位地深度创新教育的研究范式,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构建基于证据的教育学话语体系,真正为解决全人类的教育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